

林木森/编

ZHIMENDELINGXIU
MAOZEDONG
JIEFANGJUNCHUBANSHE

咱们的领袖 毛泽东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京新登字 117 号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林木森编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400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065—1975—5/K·169

定 价:7.50 元(平)

目 录

第一辑 革命情深

- 就职北图 共研马列 (3)
——始终不忘李大钊的帮助与教益
- 曾多共识 密切合作 (7)
——与瞿秋白一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 诚挚友谊 热情支持 (14)
——与邓中夏为领导工农运动并肩战斗
- 亲密战友 心永相通 (18)
——朱德永远信赖毛泽东
- 相互了解 认识趋同 (23)
——张闻天赞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 酬唱奉和 共探诗路 (27)
——陈毅倾心推崇毛泽东的诗词
- 拥护主席 心无芥蒂 (35)
——聂荣臻与毛泽东的坦诚交往
- 疾风劲草 板荡诚臣 (41)
——叶剑英与毛泽东的患难之交
- 往者不咎 来者犹追 (47)
——为李达作历史证明人

文字交往 几经寒暑	(51)
——谢觉哉给毛泽东当秘书	
运筹帷幄 料事如神	(59)
——罗瑞卿心目中的毛泽东	
聆听异议 收回成命	(65)
——毛泽东接受粟裕暂不过江的建议	
借酒征言 改变决策	(67)
——陈赓佩服毛泽东的大度与韬略	
上下信任 克敌制胜	(72)
——韩先楚衷心拥护毛泽东的作战方针	
热情鼓励 盼立新功	(78)
——与独臂将军彭绍辉的友谊	
携手调查 战斗情深	(82)
——古柏坚定支持毛泽东	
寿人寿国 应列榜首	(87)
——毛泽东称赞傅连璋	
从事战争 学习战争	(95)
——勉励陶勇当华东海军司令	
排除干扰 保护干部	(98)
——支持傅崇碧“文革”中转移老干部	
谈笑风生 不计安危	(106)
——杨奇清忆护卫毛泽东访苏	
坚持真理 搞好宣传	(111)
——与吴冷西谈五不怕精神	
早期合作 真诚相见	(120)
——陈独秀对毛泽东产生过深刻影响	

第二辑 肝胆照人

- 纳谏至诚 精兵简政 (125)
——荐李鼎铭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129)
——为爱国侨胞陈嘉庚题词
- 民主党派 继续发展 (133)
——鼓励许德珩抓好“九三”学社
- 人民监督 不敢松懈 (136)
——答黄炎培的诤诤诤言
- 最好老师 知己朋友 (149)
——续范亭敬重毛泽东
- 诗词唱和 情谊长久 (157)
——作柳亚子的诤友
- 走出书斋 参加实践 (161)
——刘仁静回忆同毛泽东的谈话
- 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 (164)
——虚心听取冒广生对整风的意见
- 全面看人 许走弯路 (170)
——要客观评价章士钊
- 能知我者 毛泽东也 (180)
——任命清廷大臣载涛为炮兵顾问
- 摆设家宴 款待“皇上” (182)
——热情关心溥仪

第三辑 尊敬谦和

- 研讨文艺 各抒己见 (187)
——与冯雪峰谈鲁迅
- 亲趋颐园 躬身看望 (192)
——到颐和园拜访丁玲
- 专程拜谒 切磋学问 (198)
——与萧三在窑洞城谈文学
- 自省弱点 方有出路 (206)
——对萧军的信任与帮助
- 尊敬谦和 谢之以礼 (219)
——给齐白石送寿礼
- 关心科技 尊重人才 (221)
——向李四光学习地质知识
- 放下包袱 坚持真理 (226)
——对遗传学家谈家桢的勉励
- 半死进来 活着出去 (229)
——李又然忆毛泽东做思想工作
- 关心文艺 尊重艺术 (238)
——毛泽东听侯宝林说相声

第四辑 博大胸襟

- 不计私怨 博大胸襟 (243)
——对要开除毛泽东学籍的张干依然照顾

钦佩奇志 破格荐举	(252)
——谭咏春力保毛泽东就学东山	
反封相通 反资相殊	(256)
——毛泽东同胡适的早期联系与后期的思想分野	
青年交友 中途扬镳	(267)
——与萧子升共察社情政见却不同	
相距万里 心息相通	(272)
——与同班好友贺果的密切联系	
共事教育 情谊甚笃	(277)
——与新民会员周世钊的纯挚友谊	
学习勤奋 体魄坚强	(286)
——张国基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	
热情如昔 乡音未改	(289)
——李振翩谈毛泽东的接见	
交友贵诚 言无浮词	(293)
——毛泽东书信致彭璜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297)
——易礼容忆当年的“驱张”运动	
远见卓识 念旧情深	(300)
——毛泽东支持周谷城的研究工作	

第五辑 勤俭廉朴

讲老实话 做老实人	(307)
——秘书高智谈毛泽东用人之道	
刻苦俭朴 诚挚待人	(329)

- 警卫李长培忆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 不论职务 都要关心 (342)
- 照顾体贴饲养员侯登科
- 日理万机 衣食简单 (344)
- 李银桥忆毛泽东在西柏坡
- 保守机密 高于一切 (355)
- 张木奇谈警卫保密趣事
- 对待疾病 顽强抗争 (368)
- 保健医生徐涛谈毛泽东的养生之道
- 畅游江河 无惧风浪 (373)
- 摄影师侯波忆毛泽东畅游长江

第六辑 以国为家

- 吾母高风 首推博爱 (379)
- 母亲文氏夫人的为良教诲
- 志向远大 步出乡关 (383)
- 父亲毛顺生同意毛泽东外出求学
- 兄弟之间 倡言时政 (387)
- 教育弟弟毛泽覃走革命道路
- 彼此相知 志同道合 (390)
- 杨开慧敬佩毛泽东的伟大抱负
- 钢铁性格 纯真感情 (396)
- 贺子珍与毛泽东亲疏皆有情
- 教子以严 动之以情 (411)
- 毛岸英的成长与牺牲

心中严师 家中慈父	(416)
——毛岸青与邵华的滚烫回忆	
坎坷相见 父女情深	(421)
——李敏对父亲的思念与眷恋	
婚姻自主 英雄气度	(431)
——毛泽东同意李讷的婚事	
欲栽大木 柱立长天	(437)
——杨昌济称毛泽东为救国之材	
昔日战友 日后亲家	(444)
——毛泽东要张文秋好好教育烈士后代	
后 记	(451)

第 一 辑

革 命 情 深

就职北图 共研马列

——始终不忘李大钊的帮助与教益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以歌颂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文，深刻而有力地影响了我国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其中，最卓越的就是毛泽东。

1914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从《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看到了李大钊写的一些重要文章。其中，《青春》和《今》，给他以极大的吸引和启示。据周士钊说：毛泽东最热爱《新青年》这个杂志，尤其是对李大钊的文章，他经常反复阅读，摘抄某些精辟的段落。他从这些文章中，逐渐认识了中国不仅需要改造，而且还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风俗、习惯等多方面进行根本的改造。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和促进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到北京。这时，原来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杨昌济已在北京大学教书。经杨昌济向李大钊推荐，征得校长蔡元培同意后，即安排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作助理员。于是在同年10月，经杨昌济的介绍，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当时，李大钊已是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但他和毛泽东却谈得很投契，经常在一起畅谈。由于李大钊热诚的帮助，使青年毛泽东深受教益。毛泽东还利用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刻苦读书，努力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开始初步探索解放中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回顾第一次在北京时

的思想变化时说：这时，“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大学图书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通过在北京的接触，李大钊对毛泽东非常器重，李大钊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认为：在北京大学和接近北大的先进青年，“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而在“新民学会会员中，毛泽东、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

1918年7月起，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连续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国内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大钊同志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于12月间写的题为《大联合》的短论，也运用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显然，这是李大钊对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的有力支持，是对毛泽东这种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充分肯定。

1919年12月，为了推动湖南反军阀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北京。他到北京大学看望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并向他介绍了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情况，介绍了许多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

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还和李大钊等专门讨论过组织赴俄勤工俭学的问题。1920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写给陶毅的信中就说：“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这就表明，毛泽东和李大钊当时都向往着列宁领导下的苏联，

热切地期望有更多的青年志士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去学习革命经验。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李大钊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讨论并确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李大钊在会上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积极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以迅速组成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时提出一定要注意保持党的独立性。毛泽东完全赞同李大钊的意见，主张实行国共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大会采纳了李大钊和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力地加速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进程。李大钊和毛泽东共同为建立和巩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3月16日，国民党农民委员会讨论决定，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于是，毛泽东即委托在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陕西省临时党部选派的代表魏野畴，立即去北京和李大钊、陈毅等，共同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派学员。于是，魏野畴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大钊和陈毅的信，到了北京。当李大钊和陈毅看过毛泽东的来信以后，立即同魏野畴在北京、天津的进步青年中选拔学员。李波涛原来已和李大钊商定好，准备去苏联学习。可是，他又突然接到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通知。魏野畴专门找他谈话：“去广州要经过四海一洋，正好力挽狂澜。闹革命要趁热打铁，不能好高骛远。毛泽东同志担任这一届农讲所的所长，他学问渊博，和我谈论农民战争史和农民运动，很有独特见解，此去定能学到不少知识。再说，你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又善长编民歌，应当在鼓动农民起义上发挥作用嘛！”李波涛听后，去请示李大钊。大钊对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才学很好，你去后自然会体会到的。你还可以帮助他整理些农民战争的资料。我写封信你带去给他，希望他常给我来

信。”同年9月底，李波涛毕业后准备离开广州。后来他回忆说，临行前，“毛所长把他写给李大钊的一封信交给我，叫我回陕途经北京时面交大钊同志。到京后，我去见大钊同志，送交了毛所长的信件。大钊同志当即派我回陕北开展农民运动。”

领导中国革命要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又要立足本国，立足于发动工农革命运动，明确认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李大钊和毛泽东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在主持农讲所期间，特意将李大钊1925年12月30日——1926年2月3日写的《土地与农民》这篇重要论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中，供学员学习和研究。这表明毛泽东对李大钊思想的高度重视。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联系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老一辈革命家成长的历史指出：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可见，毛泽东始终不忘李大钊对他的直接帮助和指导。

（杨纪元）

曾多共识 密切合作

——与瞿秋白一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和瞿秋白首次一道出席了党的大会。会议在讨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时，瞿秋白极力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两人一致认为，为了推进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和批评的自由。大会采纳了他们的正确意见。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秘书，瞿秋白是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纲的起草者。会后不久，他们都去上海，一道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后来，毛泽东回忆：“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与瞿秋白为推进中国革命第一次友好合作。

孙中山逝世以后，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趋尖锐。1925年5月，资产阶级右翼政治代表戴季陶在国民党第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要把反对阶级斗争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的谬论。6月至7月，他接连写了《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提出建立“纯粹的三民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大造舆论。为了反击戴季陶主义，共产党人在《向导》、《中国青年》、

《政治周报》上发表文章，瞿秋白、毛泽东表现得尤为出类拔萃。

1925年8月至1926年初，瞿秋白连续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文，有力地批驳了戴季陶的谬论。指出戴季陶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滑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明确宣告，开展向反革命派的宣传进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他组织并亲自撰写了《国民党右派分裂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等一系列文章，历数了自“五卅”以来，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军阀相勾结，反对罢工，反对农民抗租抗税，破坏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斗争等许多罪恶事实，戳穿了他们标榜的“纯正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真实信徒”的画皮，揭露了戴季陶反对三大政策，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诡计，呼吁大家只要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就能促进革命派更大的团结，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毛泽东与瞿秋白等对戴季陶主义的揭露批判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北京、上海、广东、湖北、江西等地的国民党各级党部也纷纷发出通电，反对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

不仅如此，毛泽东和瞿秋白还在国民党“二大”的会内会外，同戴季陶本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26年夏天，瞿秋白在上海与阔别10年的幼年好友、中宣部干部羊牧之重会，谈话中讲了会外与戴季陶交锋的一段有趣的花絮：

他（瞿秋白——笔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第一次向我提到了毛泽东同志。他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决议的休息时间，我和毛泽东等几位共产党代表正在凭栏远眺，刚好戴季陶等几个顽固派人物也上楼来，我出于礼仪，主动上前和他们几个握了手，毛泽东当然也去逐个握了手。但与戴季陶握手时，毛泽东笑着说：‘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呵！’弄得戴季陶十分尴尬。”